

第一集

中國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集刊

## 目 錄

前言	范文淵	(一)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		
抗美援朝運動簡記	劉大年	(四)
第一次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開端	丁名楠 張振鵬 沈自敏 賈維誠 余繩武 李明仁	(四)
辛亥革命時期四川從保路到獨立的經過	何重仁	(五)
辛亥革命前的幾處羣衆反壓迫鬥爭	張振鵬 丁原英 王仲	(六)

#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

——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緒言——

范文瀾

一九四〇年我去延安，組織上要我編寫一本十幾萬字的中國通史，為某些幹部補習文化之用。我當時就同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分工寫作，由我總編。由於缺乏集體寫作的經驗，對如何編法沒有一致的意見，稿子是齊了，有的太詳，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組織上叫我索性從頭寫起。一九四〇年八月至第二年四、五月完成上冊（五代十國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冊（下冊原擬寫近代史部分）。校完全書我就轉入整風運動中去，不再接觸這個工作了。這本書原來限定寫十幾萬字，但上冊寫完已有二十多萬字，事已如此，只得不限字數，繼續寫下去。所以這本書說不上有什麼目的性計劃性（當時僅擬定略前詳後，全用語體，揭露統治階級罪惡，顯示社會發展法則等幾條），只是隨手寫來，積累章節成為一本書而已。這就是編寫舊本「中國通史簡編」的經過情況。

舊本「中國通史簡編」有很多缺點和錯誤，我在一九五一年寫了一篇自我檢討，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評，幫助我改正。我在那篇檢討中所得到的對本書缺點的初步認識，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 (一) 非歷史主義的觀點

在中國歷史上佔很長時期的封建時代，一方面是包含着許多甚至對於今天的民族生活還起着負作用的沉重遺產，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這段歷史時期對於中國民族生活的發展有其積極作用。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

地位」裏指出：『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新民主主義論』裏也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這正是無產階級對待歷史遺產的正確態度。對於整個封建時代的歷史應該採取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的態度，對於個別的歷史人物，個別的歷史事件也同樣應該採取這種歷史的分析態度。無分析的一律抹殺或一律頌揚，都是主觀主義的、非歷史主義觀點的表現。

在這本書裏，有些地方的敘述就有這種非歷史主義的缺點。例如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帝王將相，就他們整個階級地位來說，沒有問題是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但是他們中間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確實也起了推動歷史進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認或縮小他們對歷史的貢獻，那是不對的。例如秦始皇結束了從西周到戰國八百多年的諸侯割據，偉大的中國第一次統一起來。他廢侯王，置郡縣，興水利，築馳道，通河渠（特別是史祿的開靈渠），修長城，統一制度和律令，統一歷法，統一文字，統一車軌，統一度量衡，商販通行全國不收關稅，拆毀國內長城與要塞，填平巨塹與各郡縣的城池，開發嶺南，驅逐匈奴，建立規模宏大，空前未有的大帝國。漢朝制度基本上承襲秦制，漢後歷代制度又自漢制逐次演變而成，秦在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所起的創始作用，有極大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敘述是不對的。漢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至少從商朝起就侵擾漢族的匈奴族，到漢武帝時，才打了決定性的大戰爭，漢族勝利了。當時匈奴還是落後的奴隸制度國家，每年侵入邊郡，破壞生產，捕捉漢人去當奴隸，打敗匈奴完全合乎漢族的利益。我對漢武帝的武功，沒有着重寫他積極的一面，却着重寫了人民所受戰爭痛苦的一面。唐太宗是中國皇帝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他擊敗了侵略中國的突厥族，建立起疆域廣大、超越前代的大帝國。漢唐是歷史上兩個光輝的大朝代，唐朝的強盛又勝過漢朝。我沒有着重寫唐太宗擊敗突厥的功業，却看作爲他父親唐高祖報仇雪恥的戰爭。宋太祖進行統一戰爭，消滅五代十國分裂的局面，在歷史上很有貢獻。明太祖驅逐元朝統治者，恢復漢族政權，在歷史上也很有貢獻，我着重寫宋太祖的官僚政治，明太祖的專制殘暴，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都沒有當作着重點顯著地寫出來。

這本書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說今」而損害了實事求是的歷史觀點。本來「借古說今」並不是絕對不可以，但如果簡單地借古人古事來類比今人今事，這就不是「一切都依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為轉移」的歷史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態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談時事了。例如舊本「中國通史簡編」裏敘述魏蜀吳三國的情形就有這個毛病。三國以前長江流域經濟文化落後於黃河流域，孫權建立吳國，推行北方的耕作方法，開闢耕地，又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洋諸國，組織一萬人的大船隊開展海上交通，長江流域經濟文化比東漢前進了一步，這些功績是值得重視的。蜀漢在四川、雲南，對少數族不採取殘暴鎮壓的政策，漢族與少數族一般還能和平相處，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三國分裂是軍閥混戰的結果，但三國國內設施，也各有其積極意義的一面。借吳蜀聯合拒魏來類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借孫權來類比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統一戰線，把孫權描寫成幾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這是不合當時的歷史事實的。又如武則天利用特務鎮壓她的政敵，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爭奪。借武則天來斥責特務統治，着重寫了特務的殘暴，而且把宮庭私事也寫了出來，意在增加對特務統治者的鄙視。事實上武則天統治的時候，唐朝還保持強盛的形勢，對人民來說，她不算是屬於壞的一類皇帝。

以上就是由於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說今」所造成的非歷史觀點的錯誤。

### (二) 在敘述方法上缺乏分析，頭緒紊亂。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這種具體的分析，首先要把生產關係劃分出來作為說明該社會形態底結構和發展，同時還要到處和經常考察那些適應於這些生產關係的上層建築物，以血和肉來把骨幹包裹起來。但事情還不止於此，馬克思說「同一的——就主要的經濟條件說是同一的——經濟基礎，仍可由無數種互相不同的經驗上的事情，例如自然條件、種族條件、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差別來。不分析這種經驗上給予的事情，是不能理解這一點的。」(「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法應用在歷史研究上，如此複雜而繁重，絲毫沒有其他輕而易舉的便宜方法可以代替。舊本「中國通史簡編」却採用了一個便宜方法來代替它，那就是現象羅列法，把互有機聯繫着的統一的整體，排列成許多各個孤立的現象。經濟基礎

與上層建築物，前一時期與後一時期，這一事件與別一事件，同一事件在此時此地與在彼時彼地，說不出或說不清楚它們中間有什麼有機的內部聯繫，結果是頭緒紊亂，不相貫通，名為歷史，實際只是一本史料彙編。對某些單獨的歷史事實，也因為缺乏分析，往往不能作出恰當的判斷。例如岳飛是抵抗女真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行動是代表民族利益的偉大行動。他曾代表地主階級攻滅洞庭湖旁農民起義首領楊么，這固然不是好事，但比起抗金來，顯然是較小的，沒有把事情的輕重說明白，在鑑定岳飛這樣一個歷史人物上，引起了混亂的看法。又如隋煬帝開運河，給當時人民帶來了嚴重的死亡和痛苦，開成以後，北至涿郡，南達餘杭，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上起着重大的作用。隋煬帝以前和以後，歷史上有不少開運河的人，他之所以特別著名，在於他使用民力太急暴，為以前以後的人所未有。着重寫了他的驕奢淫逸殘害人民，却沒有說明開運河還有其積極的意義，顯得看問題不够全面。

除了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面，其他如使用材料也有錯誤或欠妥的地方。不少史學工作者，曾經善意地給我指出，我在這裏表示感謝。此外沒有檢討到的問題當然還有，需要自己更深入的作檢討，找出全部錯誤來。

中國古代史書非常豐富，也有很多傑出的名著，但都屬於舊型類，主要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在真正科學的歷史書出現以前，只要是嘗試着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寫的歷史，總比舊型類的歷史書要好一些。這就是說，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遠不成熟比運用封建主義很成熟的歷史書，從人民的需要看來，顯然前者比後者合用，即令不是真正的合用。有些學者譏笑新型類的歷史書，說：「考訂太不講究，寫歷史鬧出好多笑話！」照我的看法，儘管笑話很多急需改正，但既然有意糾正了舊型類歷史書的某些根本缺點，這就是值得善意地去幫助它改進。舊本「中國通史簡編」也和其他新型類的歷史書一樣，毛病很多，遠遠不夠科學的水準，可是它比起舊的以封建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觀點來寫的歷史書，却有本質的不同，許多寫法在舊型類的歷史書裏是沒有的。

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在編寫時，一方面主觀上力求減少已經檢討出來的錯誤，一方面仍保留舊本的某些寫法，並且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觀點，概括說來，計有下列九點。

## 一 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出：「歷史科學，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本書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把舊型類歷史觀帝王將相作爲主人的觀點否定了。

## 二 階級鬥爭論是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

「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說：「迄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原始公社底歷史除外——恩格斯補充說）。列寧在「卡爾·馬克思」裏指出：「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基本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彷彿迷亂混沌的狀態中找出一種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論」。忘記了這條線索，固然不可能講明歷史，但是，即使記住了這條線索，要講明歷史也還是很困難。因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幫工，簡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是處於互相對抗的地位，進行着不斷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若不是全部社會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門爭階級同歸於盡」（「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的情景既是那樣複雜，要瞭解它，不僅要分析各個階級相互間的關係，同時還得分析各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然後綜觀它們在每一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和變化。如果只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要做具體的分析，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修養，是不可能做好的。本書正是這樣。它雖然注意到寫階級鬥爭，着重敘述腐化殘暴的統治階級如何壓迫農民，和農民如何被迫起義。這與舊型類歷史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屬農民起義是

「流寇」「土匪」，描寫成爲野蠻人，把所謂「官軍」的真正野蠻行爲，大都擇到起義軍賊的寫法比起來，總算是糾正了謬見，肯定了農民起義的作用。至於外族統治者的侵入，本書也着重寫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羣衆的英勇抵抗。寫農民起義和反抗外族統治者的侵略，意在說明中國人民確有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偉大傳統，但寫得很膚淺，遠遠不能說明階級鬥爭的實際情形。

### 三 在生產鬥爭中的科學發明

恩格斯給史密特的信裏說「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愚想漸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誕性日愈減少着的愚想所代替的歷史。」本書注意收集生產鬥爭的材料，古代科學的逐步發明以及有關農業手工業的知識還是寫的不少。例如絲織、煉鋼、造紙、製瓷、印刷、火藥的逐步發展；茶樹、早稻、棉花的大量種植。又如南宋江西浙江有人使用投鐵片入膽水，提煉出銅的方法。東漢末曹操開始用石炭。漢時高奴縣（延安縣東）發見石油，北宋用來點燈。唐時海船特別巨大，能抵當波斯灣的險惡風浪。宋時航海用指南針定方向。諸如此類，自信在主觀上是十分重視的（當然還有不少被遺漏），只是因爲知識缺乏，不能多作解釋。

### 四 漢族社會發展史的階段劃分

列寧在『論國家』裏指出『這件基本事實，即社會從原始形態的奴隸制度過渡到農奴制度，然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事實，你們始終都應該注意到，因爲只有回想起這件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都放置在這個基本範圍內，才能正確估計這些學說，並認清這些學說底實質。……所以要認清這一切異常繁複複雜的情形，……就必須穩穩把握

住這個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把握住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作為基本領導的線索，並從這個觀點上去剖明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列寧指示我們，研究歷史首先要明確地劃分社會發展的諸階段，給歷史畫出基本的輪廓來，然後才能進行各方面的研究。本書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歷史結合起來，說明它曾經經過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諸階段。雖然寫的未必正確，但方向顯然是正確的。

## 五 漢族封建社會的分期

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很緩慢的。舊本「中國通史簡編」把封建社會分成三個時期，現在看來，第二第三兩個時期的分法是有錯誤的。修訂本分為初期（西周至秦統一）、中期（秦至隋統一為中期前段，隋至元末為中期後段）、後期（明至清鴉片戰爭以前）三個時期，似乎比較恰當些。下面敘述為什麼劃分三個時期四個大段的理由。

第一大段、初期封建社會——自西周至秦統一。西周初年，相傳大小國家和部落多至數百個。西周建立起王權，天子掌握禮樂（制度）征伐，在漫無秩序中他是秩序的代表。恩格斯說：「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下，王權是一種進步的因素，這乃是極顯而易見的。」（「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發展」）東周時期王權衰落了，領主們為奪取土地與人口，進行兼併戰爭，數百個國家和部落因此合併成十幾個大國，戰國時期剩下七個大國。這是含有進步性的兼併。東周戰國的兼併戰爭，正如馬克思給恩格斯信裏說：「一般地，戰爭對於經濟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大體說來，兩周是衆諸侯割據，諸侯國內衆采邑割據的局面，到戰國時，山東六國內部基本上統一了。秦國比六國表現出更高的統一性，因此它有力量消滅六國統一全中國。

在這個大段裏，階級的概狀是：統治階級方面，起初是宗族土地所有制的貴族領主階級統治着大小國家和采邑，後來興起了家族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階級。東周時領主階級內部進行戰爭，戰國時代表地主階級的秦與主要代表領主階級的

山東六國間進行戰爭，最後地主階級取得了勝利。被統治階級方面，商朝耕種奴隸經過各種鬥爭（消極的反抗如逃亡，積極的反抗如配合周兵陣上起義），西周時基本上轉化為農奴了。東周戰國時期，農奴參加了貴族領主階級內部鬥爭客觀上起着削弱領主統治的長期兼併戰爭，農奴又轉化為農民（當然不是說，不再有相當數量的耕種奴隸和農奴殘留着）。從少數貴族領主的佔有大塊土地，變化為比較多數的地主佔有土地和更多數的農民各佔有小塊土地，是一種意義重大的變化，當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是建立在階級變化即所有制變化的基礎上的。馬克思說「奴隸並不會出賣他自己的勞動力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出賣牠自己的服役給農民一樣。奴隸連同他自己的勞動力一次永遠出賣給他的主人了。……他本身是商品，可是勞動力却不是他的商品。農奴所出賣的祇是自己勞動力的一部分。並非他從土地所有主方面領得報酬，而是相反的，土地所有主從他那裏收得貢租」〔「僱傭勞動與資本」〕。農民當他保有耕地的時候，形式上是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比農奴進一步地實現了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西周至戰國八百餘年中，生產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基本上有這樣的三次大變化，也就是生產關係有三次大改革。在不多的史料裏，足以說明中國勞動人民從來就是善於對統治者進行偉大的階級鬥爭的。商朝手工業奴隸，西周以來，一直被統治階級佔有，不得釋放。但在東周時，民間手工業却逐漸生長起來了。

第二大段，中期封建社會的前段——自秦至隋統一。秦是一個短促的但有極大重要意義的朝代。秦始皇為統一事業作出了許多重大措施，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個統一的大帝國決不是「暫時的（雖然秦朝是短促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也決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那種民族統一國家，而是必須體會毛澤東同志給予我們的教導，確認秦以後的統一是「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的統一。

繼秦而起的兩漢，是國力強盛的，地主經濟很繁榮的朝代，它們把這個統一國家進一步鞏固了。正因為中國的統一是「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的統一，大概自西漢中期起，代表地主階級的豪強逐次加劇了割據行為，由於赤眉黃巾兩次農民大起義都被鎮壓下去，割據勢力愈益强大起來。豪強強迫窮苦農民當類似農奴的徒附（徒附

就是法律上還不可以買賣的農奴），強迫更窮苦的農民當奴隸，又築起無數塹壁，迫使徙附當部曲（私兵），幾乎恢復了兩周時期的大小采邑。黃巾起義失敗後，豪強乘勝互鬥，爆發了軍閥大混戰，生產力遭受空前未有的大破壞。軍閥吞併的結果，成立魏漢吳三國。三國分立對東漢末年的大混亂說來，是趨向統一的一個步驟，也還有它一定的進步意義。

曹丕司馬懿等人為取得政權，向士族（官僚集團，是豪強的一部分）讓步，用九品中正法取士，實際是和高級士族分享政權，中央集權的力量大大削弱了。西晉統一後，政權為若干家高級士族所把持。晉武帝大封王侯，企圖牽制高級士族，結果招致了八王之亂。統治階級極度腐敗，它不僅殘酷地剝削農民，同時也嚴重地壓迫中下級士族和居住在國境內的匈奴、羯、氐、羌、濱等半漢化的少數族。等不到農民起義來推倒西晉統治，中下級士族結合少數族的豪強起兵反晉，推倒了西晉朝廷，報復了高級士族，而且殘暴地蹂躪了漢族人民，頻繁地進行了各族間的互鬥，造成一百幾十年的大混戰。向來是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的黃河流域，經東漢末年一次大破壞以後，現在又來一次歷時更久的大破壞，社會幾乎被毀滅了。鮮卑族乘虛侵入，最後鮮卑族拓拔部貴族聯合漢族的北方士族，統一了黃河流域，建立起北魏國，與漢族政權的南朝對立。到隋統一南北，才結束了這個長時期的對立狀態。

在這個大段裏，階級的概狀是：統治階級方面，地主階級和它的代表者士族，一直朝着周朝貴族領主的老路上走回去，魏晉九品中正法就是皇帝承認他們半合法領主的地位。北魏崔浩竟公開主張恢復周朝的五等封爵制，要求朝廷承認高級士族做完全合法的領主。這和皇帝的權利衝突太劇烈了，北魏皇帝被迫族滅崔浩並大殺士族，抑制了這個要求。被統治階級方面則是很多農民被迫當豪強的徒附。由於農民的窮極破產，奴隸數量不斷在增加。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都佔有奴隸，迫使他們從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上的勞動。奴隸生產品（一部分供主人自己消費）的成本當然是比較低廉，民間農業和手工業的經營者必須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奴隸同樣，才能把自己的生產品和別人交換。事實上因為負擔着沉重的賦稅，即使生活費降到奴隸的水平，實際收入並不能相等。所以奴隸生產的存在，大大障礙了民間生產的發展。

自西漢中期以至南北朝，奴隸數量顯然是巨大的，但因此說當時社會還是奴隸社會，這就錯誤了。須知奴隸祇是農

民階級（有田者和無田的徒附）中最不幸的那一部分，比起農民來，奴隸自然是少數，在生產中也只有附屬的地位。如果說第二大段是第一大段的循環，這也是錯誤的。它不是循環而是螺旋式的發展，雖然前進得不是很遠，但終究是前進了。統一國家的成立，就是最顯著的前進。

第三大段，中期封建社會的後段——自隋至元末，隋和秦相似，統一後不久就崩潰了。這是因為秦隋的統一都是統治階級內部互相吞併的結果，舊勢力並沒有受到打擊，過了一時以後，它又放肆起來。祇有經過大規模的農民戰爭，舊勢力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新的統治者接受了嚴厲的教訓，新的統治者不得不對農民讓些步，這才有可能產生新的盛大的朝代，進一步鞏固國家的統一。漢唐兩朝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唐比漢更盛大。唐朝前期實行均田制，農民一般可以得到土地，這就是唐之所以成為盛大朝代的根本原因。由於農民得到土地，官私奴隸大大減少了（家庭內役使的奴婢除外），民間手工業商業加速地發展起來了。

支持隋唐以來社會經濟上升的條件，除官私奴隸大減外，主要有下列幾點：（一）長江流域經東漢孫吳特別是南朝的開發，南方經濟趕上了黃河流域。隋唐時，恢復了繁榮的黃河流域以外再加上長江流域，封建經濟的地盤至少擴大了一倍，並且以此為基地，繼續向閩江珠江兩流域逐步擴大。（二）自隋唐時起，航海技術進步，海上貿易比陸上貿易更為有利，加增了中國與外國間的交換關係。（三）國內和對外的商業刺激了手工業的發展，商業稅和手工業稅逐漸成為國家收入的一個重要部分（當然遠不及地稅的重要），因此減輕了統治者對民間工商業的壓迫。（四）貨幣量大有增加。貨幣的作用雖然還不到破壞封建經濟的程度，但地主自給自足的經濟比南北朝以前更削弱了，因而民間工商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唐朝中年，封建割據戰爭又開始爆發。此後中央集權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經過長期相持不決的鬥爭，因黃巢農民起義軍的失敗，割據勢力愈趨猖獗，中國陷入五代十國的大分裂狀態中。黃河流域遭受軍閥戰爭的破壞，北方邊境為契丹族統治者所侵佔，但長江閩江珠江三流域却因割據者保守境界，開發荒地，經濟在繼續前進，從此南方經濟超過了北

方。趙宋統一中國後，政治上一切措施都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和抑制割據勢力。稱爲道學或理學的哲學與倫理學，對政治也起着嚴重的輔助作用。在鞏固統一這一點上，趙宋是成功的。北宋以後，中央對地方的統治愈益強固，不再有公開的地方割據現象。北宋政治統一給予經濟的影響是手工業和商業比唐朝有更大的發展。女真族統治者乘北宋朝廷極度腐敗，武力侵佔黃河流域，建立起破壞作用很大的金國。南宋苟安於長江流域，繼續着北宋的腐敗政治。南宋經濟却不斷在上升。蒙古族統治者武力消滅金國，又消滅南宋，統治了全中國。元朝的破壞作用比金更強烈，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黃河流域，農業生產遭受極大的摧殘。不過，在手工業商業方面，因元朝疆域廣大，中外貿易的通達和中外手工業技術的交流，雖然手工業工人陷入類似工業奴隸的厄運中，但工商業還相當地保持着前進的趨勢。明太祖所領導的農民戰爭取得勝利後，結束了元朝的野蠻統治，社會又走上發展的階段。

在這個大段裏，階級的概狀是：統治階級方面，地主階級不像南北朝以前那樣，既剝削農民（主要是徒附）又剝削奴隸，而是比較單純地以佃農爲主要剝削對象了。小商賈小手工業者和農民以前是不許參加政權的，北宋以後通過科舉的道路可以參加政權，而且取錄的標準比唐朝放寬得很多。這是因爲民間工商業者已經有相當大的經濟力量，迫使統治者向他們讓步。私鹽商和不第進士黃巢的領導起義，也給沿襲南北朝士族制度餘風的唐統治者以嚴重的打擊。北宋朝廷向社會下層人開放政權，是一種聰明的措施，由於社會下層少數人的參加政權，統治階級的基礎擴大了，對內的統治力量加強了，反過來說，農民起義反抗的困難也愈益增加了。被統治階級方面，農民淪落爲奴隸已成很個別的現象。窮困失地的農民投地主家當佃戶，生活自然很苦，不過比漢朝以後的徒附（名稱各朝不同，如西晉蔭戶也是徒附一類的農民）終究是好了一些。小工商業者到唐朝才有行會的組織（唐賈公彥周禮正義說肆長若今行頭。這說明唐時有行會的組織，它的管事人稱爲行頭）。行會的組成，一方面表現了封建社會裏「交換的局限性、市場的局限性、生產方式的穩定性、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地方閉塞性、生產者只限於當地的聯繫」；但在另一方面則是表現了小商品生產者有可能在城市範圍內以及在各個行業內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經濟地位。南北朝以前，民間工商業的競爭者是奴隸勞動，使用奴隸的是擁有特

權的統治階級，因之民間小工商業無法組織行會來反抗奴隸勞動。唐朝出現行會組織，說明和小工商業者競爭的已經不是奴隸而是另一部分的小工商業者，從這個意義說來，唐以後的小工商業比南北朝以前確是發展了。馬克思說「工藝這件東西，可以啓示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的關係，啓示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資本論』第三卷）。唐以後手工業免除了奴隸勞動的障礙，有可能作較快的進展，雖然行會到後來阻礙着競爭的加強，使技術趨於停滯狀態，但在當時應該說是有它一定的進步意義。

第四大段，後期封建社會——明至清鴉片戰爭以前。明太祖驅走元朝統治者，建立起漢族的朝代。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制度到明朝達到極高極密的程度。明朝皇帝除了明太祖和明成祖，一般是凡庸貪暴的皇帝。以皇帝為首的皇族、貴族、太監、官僚、紳士、土豪大量集中土地。農民失去土地，只好充當佃戶，有些農民被迫投靠勢家當奴隸。這種奴隸，主人對他們祇有不完全的所有權關係，所以他們實際上是農奴性質的奴隸。佃戶和農奴數量的不斷增加，農業生產力自然而然要受到傷害。手工業和商業在元朝的基礎上又有進展，某些地方出現了規模不大的手工工場，也就是說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裏指出：「只有存在着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有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資本家能够購買它並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它，因而只有在國內存在着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時，商品生產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依據這個原理來看史料，明朝確實存在着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制度了。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七月『明實錄』有蘇州織工抗苛稅鬥爭的記載。曹時聘奏章裏說：「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然榷網之設，密如秋荼，原奏添隨，本地光棍以榷徵為奇貨。吳中之轉版日稀，織戶之機張日減，加以大水為災，窮民之以織為生者岌岌乎無生路矣。五月初旬……（太監孫隆等）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人情洶洶，訛言四起。於是機戶皆杜門罷織，而織工皆自分餓死，一呼響應……。吳民……浮食奇（孤苦）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賈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驅之死亡之地，臣竊悼之。四郡額賦歲不下數百萬，何有於六萬之稅，不亟罷之，（何）以安財賦之重地哉」。這裏所說機戶就是擁有生產資料

剝削僱傭工人的原始資本家，所說織工染工就是出賣勞動力的僱傭工人。這種工人已經完全離農業而分立，不出賣勞動力就不能生活。從稅銀看來，機張稅比農業稅是六萬兩比數百萬兩，所以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裏還祇是胚胎或萌芽，但是，這是極可珍貴的胚胎或萌芽。

這裏還得說一說當時織工鬥爭的情形。織工領袖葛賢一呼，織工羣起響應，包圍織造衙門（孫隆是蘇杭等處提督織造），要求罷稅。據「明實錄」記「蘇州民葛賢等縛稅官六七人投之於河，且焚宦家之畜稅棍者」。又記他們「斃黃建節（孫隆的走狗）於亂石之下，付湯莘（本地棍徒）等家於烈焰之中，而鄉官（劣紳）丁元復家亦與焉。不挾寸刃，不掠一物，預告鄉里，防其延燒，毆死竊取（乘機掠奪）之人，拋棄買免（納賄求免）之財。及湯莘等被責枷示，一揮而散，葛賢挺身詣府自首，願即常刑，不以累衆」。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驅者當他們在一六〇一年第一次起而鬥爭的時候，就表現出反封建壓迫的英雄氣概。他們行動服從葛賢的指揮，有卓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拋棄賄賂，不貪一絲非義的財物，有純潔不可濫犯的高尚品質；保護鄉里，專打貪官劣紳棍徒，連明朝皇帝也祇得承認他們「止破起釁之家，不及無辜一人」，這預示工人階級有創造社會新秩序的全能全力。葛賢在鬥爭勝利後，知道不犧牲自己，織工們將受到更殘酷的傷害，他就挺身而出，願受死刑。這種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精神，在三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還是光芒萬丈，引起人們無限的同情。中國工人階級當它開始萌芽的時候，就充分地顯示出它將有遠大的光榮的前途。列寧寫道「我們充滿民族自誇心，因為大俄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大俄民族能够給人類標榜為自由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模範」（論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誇心）。是的，中國人民也都有權充滿民族自誇心，因為三百五十年前，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驅者為反抗封建統治而作出了鬥爭的偉大模範。

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推倒了明朝的統治。滿洲統治者與漢族地主階級互相勾結，擊敗了農民起義軍，中國的統治權落入清朝貴族的手中。清朝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壓迫是極其殘酷的，但是，它在政治上却有很強的統治力量。清朝武力強盛，在明帝國基礎上，開拓了廣大的疆域，在征服漢族前後，也征服了其他許多民族。它這樣做，當

然是想滿足統治集團的佔領慾。列寧說「工商業資產階級很實際的利益是這種仇恨心理（民族仇恨心理——引者）底主要基礎，而把民族情感當作獨立因素來說，就不過是抹煞問題底實質」。列寧又說「除非在每一單個國家內把被壓迫者階級組織和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壓迫者階級的鬥爭……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民族仇恨心理」（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其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封建地主階級也和資產階級一樣，它為自己「很實際的利益」，使用暴力征服其他民族，並在各民族間製造仇恨心理。這種血跡斑斑的悲痛事件，曾在歷史上寫出很多的篇幅。可是，從中國各民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英明的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翁的今天看來，我們有大好河山的祖國和兄弟衆多的民族大家庭，在這一點上，清朝統治集團客觀上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由於清朝疆域的擴大，封建地主經濟比明朝更繁榮了。手工業商業在明朝的基礎上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如果說，唐宋統治者並不感覺到海外貿易對封建經濟不利的話，那末，明清兩朝已經潛意識地感到它的某些威脅。明朝厲行海禁，清朝更加嚴格。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主要是企圖阻遏民間對海外自由通商。事實上明清兩朝都不能禁止對外貿易的實際進行，但若干地區正在發芽的資本主義已受到嚴重的壓制，發展的速度因而遲緩起來。不過，即使如此，中國資本主義終究是鵝行鴨步地在前進。

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記廣東冶生鐵爐情形，說「凡開一爐，約計司爐者二百餘人，掘鐵礦者三百餘人，汲水者燒炭者二百餘人，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一鐵爐費須萬金。日得鐵二十餘版（一版約三百斤）則利益，八九版則傾本矣」。一個冶鐵爐約有人工一千人，規模是不小的。這種冶生鐵的爐稱為大爐，別有冶熟鐵製鑠（鐵片）的爐稱為小爐。小爐一肆（鋪）有數十砧，一砧有十餘人。爐中燒鐵圓透紅後取出置砧上，「一人鉗之，二三人錘之，旁十餘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輟，然後可煉熟而為鑠也」（范端昂《粵中見聞》）。雍正九年查禁鐵鍋出口上諭裏說「檢查案冊，見雍正八九年造報夷船出口冊內，每船所買鐵鍋，少者自一百連至二三百連不等，多者買至五百連，併有至一千連者。查鐵鍋一連，大者一個，小者四五六個不等。每連約重二十斤不等。……計每年出洋之鐵鍋為數甚多」。製鐵鍋鋪多在南海

縣佛山鎮，所製鐵鍋暢銷內地並大批出口，想見工場規模也不小。『廣東新語』載『廣之線紗與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綵光緞皆為嶺外、京華（北京）、東西二洋所貴。予「廣州竹枝詞」云：洋船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綵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這說明廣東絲織物是當時出口的重要商品。雲南礦廠在清初也很發達，崔乃鏞『東川府地震紀事』說『廠人累萬。廠有街市巷陌』。又說『廠數百硐，硐千百砂丁（礦工）。一硐有七十三尖。尖者，各商取礦之路徑也。每尖至少不下十四五人。……大抵廠商聚楚吳蜀秦滇黔各民，五方雜聚，誰為親識，貪利亡軀（壓死）蓋不知其凡幾。』一個礦廠人數多至一萬，砂丁來自各省，被廠商役使，『死亡等諸蝼蟻』。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性，連封建主義者的崔乃鏞也認為『亦慘甚已！』魏源『聖武記』說廣西大的礦廠，有鑿工、挖工、搥工、洗工、鍊工、搬運工以及管事人、幫閑人，總數不下萬人，規模與雲南礦廠相等。大抵鴉片戰爭以前，手工工場規模最大的是礦廠，其次是紡織業。它們的生產品，銷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其次才是出口，這和海禁是有關係的。中國商人不能公開主動去找海外市場，只能等待洋船來收購，或採用不合法的方法私運貨物出洋，資本主義在封建主義壓迫下，不可能充分發展起來。

鴉片戰爭前後，廣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紡織工場，工人約五萬，平均一工場約二十人。這種工場部分的使用機械，並且進行不完全的分工。又有一個製茶場，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當時廣州還不算最重要的紡織地區，長江下游如蘇州松江杭州等地絲織業和棉織業比廣州發達得多。至於江西景德鎮的燒窯業，四川自流井的製鹽業，中南西南各省的採礦業，都是規模不小的的手工業工場。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裏指出：『家庭手工制的大生產當然是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我們在這裏看見這資本主義形式的一切標誌——已經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生產資料集中於個別私人手中，工人大眾遭受剝奪，這些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並因此而把自己的勞動附屬於他人的生產資料，不是為自己工作而是為資本家工作。顯然，這種手工業按其組織說來已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它與巨大機器工業比較起來的特點，就是技術不發展（這主要是因工資低得不成樣子），以及工人們保存有極小一點農作業。』按照列寧這個原理，可以斷言明朝萬曆以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早已萌芽，清朝則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所差的祇是工資太低，